

农民工城市融入： 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

胡艳辉

摘 要:农民工的融入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它已经成为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具有二维性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体现了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农民工双重特性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在这种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融入”或“半融入”于城市社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必须树立农民工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其政治行为的理性。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政治意识;政治参与

目前,我国每年有超过 2 亿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他们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社会的进步。而当我们看到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对城市的认同等问题,这影响到城市的稳定与发展。一直以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深深的关联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进步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思考与讨论以及全社会的关注。认识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破解影响农民工融入的难题,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农民工政治融入是重塑“社会人”的关键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1]而农民工融入的维度表明,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

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被认同的过程中,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是关键。可以说,农民工政治融入是农民工作为“社会人”重新社会化的支撑点。

(一) 农民工政治融入的维度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它涉及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文化心理各方面的转变与重新适应,它就是一个重新适应社会的过程,包括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2]基于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包含经济生活的融入、社会日常生活的融入、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这三个层面的融入是作为一个外来农民工适应社会的基本条件,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依次递进。其中经济层面是最基础的,即职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层面的交往才可能达到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即文化和心理层面。^[3]在这里,社会融入包括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的交往、居住空间、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而梁波、王海英提出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时,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被看成是重要的测量指标^[4],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胡艳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湖南长沙, 410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文明研究》(11BZZ003)。

度包括对城市社会组织、党团活动以及社区选举活动的参与度。刘婷也认为政治的融合度即农民工对政治的关注度、政治参与渠道等也是考量其城市融入程度的重要内容。^[5]王佃利,刘保军等根据德国学者恩泽格尔建立了移民分析的四维度模型——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6],从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度层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等四个维度建构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框架。^[7]其中制度层面包括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政治参与等内容。总结学者研究,农民工政治(制度)融入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行为。

(二)农民工政治融入的递进关系

目前,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从经济层面融入、社会层面融入、制度层面融入、心理层面融入四个维度建构的分析表明,政治层面融入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更加凸显。其一,农民工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往往有利于农民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地位的提升;其二,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促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一个公共空间与平台上加强交往互动与彼此的了解;其三,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强化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身份意识,对于他们来讲,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寓所”,他们也不再仅是城市的一名“过客”,加强了城市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总之,农民工政治意识与行为有利于提升和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提升社会资本,有利于完成城乡身份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观念的转变,最终促进了农民工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层面的全方位融入。

鉴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四个维度中政治融入的重要性,本文将基于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维度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

二 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政治意识特性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它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8]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具体指的是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公共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权利法制意识等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的政治意识的探讨表现出了两方面的倾向。

(一)农民工政治意识的二维性

蔡华杰认为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性不

同,政治意识分为非参与意识、非主体参与意识和极端参与意识。^[9]具体表现为一部分农民工不愿介入政治,对国家大政漠不关心,如在城里,有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一部分农民工虽对自己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定的自觉,但对参与制定政令法规采取消极的态度,一味顺从各级政府的政令;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方式追求自身的权益。有学者认为受到户籍制度、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主人翁意识差,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无组织性,个体随意性强;参与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趋势明显。^[10]赵文正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农民工政治意识的时代性较明确,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式——选举的基本认同,现代“公民”意识初步形成,政治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政治认知基本理性并具有一定水平。这些研究表明:农民工政治意识正沿着传统——现代的演进主路径发展。^[11]部分学者指出我国农民工的政治意识表现出二维性。一方面,农民工民主选举意识逐渐增强,自主参与意识萌生,法治意识、维权意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对政治冷漠,民主选举意识淡薄,法治意识、利益表达意识薄弱,维权意识缺乏。^[12]

(二)农民工政治意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面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流动逐渐加强的客观条件,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发生着转变。社会流动使得农民工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沿着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变迁,流动带给农民的是传统性的不断削弱和现代性的不断增强。^[13]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差异,在这里生活节奏更快,信息渠道更广阔,竞争意识更激烈,民主意识更普及,这一切都激发了他们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在高速流动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城市现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逐步具有了现代意识,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政治意识体现出了较明确的时代性,他们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政治认知基本理性并初步培养了现代公民意识。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社会存在产生不同步性,政治意识同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但是它具有滞后性,而且它还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实现自身的嬗变。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臣民文化的影响下,农民

培养出权威意识、等级意识与顺民意识,他们对统治者具有无尽的义务,而没有权利的意识,对政治表现出冷漠与疏离。由于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现在,农民工政治意识正沿着传统——现代的主路径演进,而与此同时,其非现代性政治意识,如传统臣民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的功利性依然较浓,政治价值在一定层面上的扭曲,反体制和反规则的流民政治意识潜生滋长着。

由此可见,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在城市生活过程中与城市环境的影响下接受了现代政治文化,政治意识表现出了现代性,同时由于自身条件素质,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城市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也表现出非现代性。而农民工政治意识的二维性实质就是其政治意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双重特性。

三 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政治行为特征

政治参与指的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政治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国家的人民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常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种特色。无论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来判断,还是从主观的心理态度来评判,个人在获得现代性后,必定会变成活跃的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14]因此,农民工在政治层面上融入城市被期望为,随着在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时间与经历的增长,他们逐步获得政治的现代性,接受现代政治文化,积极参加城市政治生活,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积极影响政治权利体系以及公共政治生活。在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存在如下问题:政治参与边缘化、政治冷漠与政治渴望并存、政治参与目标认识模糊、政治信任度不高。^[15]邓秀华在对湘粤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度较高,但政治参与行为受阻,只有21.6%的调查对象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仅5%的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16]虽然,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各种问题,但随着社会的改革,农民工政治权利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参与的边缘到参与的中心。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条途径

南斯拉夫的政治参与分为公共活动、自我管理、个别接触以及投票四种形式。^[17] Arthur H. Miller 等人指出,“不同群体之间不同的政治参与一般都用可利用的资源理论来解释。更多的资源,被假定为会促使人们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但是,在美国社会一些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水平远远高于人们仅仅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的估计。人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群体成员对他们作为被剥夺群体的自我意识推动了政治参与”。^[18]有学者得出结论,公民权和经济社会地位也会影响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一点说明这些因素不仅仅会型塑传统政治行为,还会型塑非传统政治参与”。^[19]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政治权利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政治参与采取土么样的方式。目前,国内学者将农民工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来研究。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民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进行政治参与,如符合法律程序的投票选举、集会游行等,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民“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是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20]如绑架、上访、骚乱以及其它报复性的攻击行为。

(二)农民工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交织

在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往往被看着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参与途径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主化程度不断提升,农民工获得的政治权利不断得到扩大;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农民工政治权益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已占该群体主体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与文化素质方面已经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他们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并且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水平的制约、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完备法律法规的限制,不少农民工在正当权益受到伤害而利用制度化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往往变化采用抗议或者暴力的极端方式进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关注我国农民工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学者们认为由于农民工受到经济条件、户籍制度、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素质以及城市的

社会排斥等现实阻碍,走上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首先,进行制度参与的物质条件不具备。经济因素决定和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即使近几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明显地提高,但是他们大多数往往从事脏、累、苦的劳力活,并且随时面临工资拖欠、失业、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问题。其二,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两头悬空。我国的选举法规定,农民工需要回到原户籍地参加选举,这意味着农民工要想进行政治参与,就必须付出高的经济成本,而又由于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家乡的政治权利的行使对自身的权益并非紧密相关,他们更关注的是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二元户籍制度的“户口”限制使其无法参与当地的政治选举。其三,政治文化落后导致公民意识淡薄。传统的政治文化让他们成为“顺民”,远离政治,对政治冷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通过“走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等形式寻求解决而不是找当地政府,如郑功成和黄黎若莲在深圳、苏州、成都与北京等地的调查显示,只有 1.4% 的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首先会想到向当地政府求助。^[21]在自身利益受到切实损害到忍无可忍,而又无“关系”可走时,农民工便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铤而走险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着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排斥以及城市居民的不友善,即使他们愿意参与城市社区的管理,但实际参与的往往却很少,他们内心想与城市居民来往,而在实际交往中却对城市居民“避嫌”。邓秀华认为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动机狭隘性、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的无序化和非组织化、参与效果差与政治效能感低等特点。^[22]

从农民工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日趋合理和理性。但与此同时,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居住空间、身份、观念、认同的转换难题,他们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往往受到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与指导,当自身认知水平跟不上社会环境变化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极端或暴力的方式做出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因此,农民工政治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

四 三维空间的农民工城市“半融入”

“政治文化是构成政治系统成员的心理倾向和

主观意识,他们所接受和具备的政治文化指导和决定着他们的行为。”^[23]在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农民工的政治意识表现出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特点,而在现代性与非现代性政治意识的影响下,农民工的政治行为表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的特点。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行为相互构建,形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农民工群体所形成的政治亚文化说明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在政治层面呈现“半融入”状态,他们接受现代性政治文化,理性地运用正确的法律途径去维护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突破现存制度规范运用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去获取自身合法乃至非法的权益。在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形成了三维空间的融入状况。

(一) 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农民工的经济融入是其在城市立足、融入城市的物质保障,它包括职业、经济收入、居住条件等内容。农民工进城以后找到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进入了城市的生产空间,他们由从事农业生产变化为非农业生产,成为产业工人。但是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城市居民所不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并不高,按照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 2009 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17811 元计算,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六成多达不到平均水平。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意味着居住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转换,他们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目前,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落魄、即将拆迁的“市中心”或“城中村”等城市边缘地带,在居住区域上与城市居民相隔离,与“同乡”、“熟人”其他农民工住在一起,他们在城市建立“熟人社区”。

(二)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完成了地域空间的转换,一般来讲,地理位置的转换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来说,这是最容易完成的。而农民工城市融入还包括另一空间的文化转换与生活空间的转换,这就需要农民工了解学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规则等等,具体闲暇时间的娱乐休闲方式、社会交往、寻求社会支持的对象、参加社会组织情况等。据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中只有 56.19% 的人享有 8 小时工作权利,有 43.31% 的人每天工作达 9—14 小时,还有少数人每天工作多达 15 小时以上,处于超强度劳动状态。^[24]由于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因此农民工的娱乐休闲方式较为传统。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的是看电视、看

报纸、听广播、逛街、聊天、聚会,占了大多数的闲暇时间,而上网打游戏、去图书馆或电影院、旅游这三类较城市化的休闲娱乐活动比例较低,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方式与城市人还有较大差距。在城市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工会选择向“朋友”、“熟人”乃至“老乡”求助,而不是当地的城市居民或者政府。农民工对当地的社会组织不了解、不信任而较少参加,但是他们偶尔会参加诸如“同乡会”的组织。

(三) 农民工的心理融入

农民工融入城市经历了一个从外部到内核的过程,一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融入往往是外缘的融入,它们为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建立了一系列客观的结构性基础,而这个外部基础作用于农民工,最终使农民工从内在心理完成城市融入。农民工心理融入主要是身份与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城市的认同。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其身份由农民转换为产业工人,身份发生了转换。但众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份仍是农民,他们进城的目的是挣钱,他们的最终归属仍是回到老家。即使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希望未来将定居于城市,但是他们仍不认为自己就是一名产业工人,对于未来,他们充满迷茫,不确定感强烈,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城里居民不够友善热情、客气礼貌和难以沟通,不愿意过多的与其交往。

通过上述经济、社会、心理三维空间的考察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的“半融入”状况,尤其在农民工的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制度层面的“半融入”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的“不融入”与“半融入”状况。如在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当农民工经济权益受到伤害,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而是采取威胁、游行、上访甚至绑架等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在亚政治文化氛围中,农民工更愿意与相似群体往来,建立同质社会关系网络,出现社会交往“内倾化”,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仍保留以前的生活风格与行为方式;同质关系网络交往的密切,使得农民工更加与排斥城市居民往来,不认同甚至是仇视城市居民,这将加剧导致城市的稳定。因此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从其政治意识与行为入手,这就需要农民工树立现代性政治意识,同时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加强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参考文献:

- [1]杨瑾.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与幸福指数研究[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 (4).
- [2]张利军.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06, (6).
- [3]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1995, (5).
- [4]梁波,王海英. 城市融入: 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J]. 人口与发展, 2010, (4).
- [5]刘婷. 广州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2, (5).
- [6]梁波,王海英. 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
- [7]王佃利,刘保军,楼苏萍.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框架建构与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2).
- [8]虞崇胜. 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 (3).
- [9]蔡华杰. 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透析[J]. 社科纵横, 2006, (4).
- [10]郭立场,陈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对策[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3).
- [11]王亚新. 和谐社会视野中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状研究[J]. 社科纵横, 2009, (2).
- [12]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24.
- [13]赵文正.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以孝感市 1000 个案的调查为例[J]. 湖北社会科学, 2006, (6).
- [14][美]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殷陆君编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61.
- [15]任中平,刘刚.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不可忽视的四农问题[J]. 云南社会科学, 2006, (2).
- [16]邓秀华.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1).
- [17]胡荣.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J]. 社会学研究, 2008, (5).
- [18]Arthur H. Miller, Patricia Gurin, Gerald Gurin, Oksana Malanchuk.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1, 25(3): 494.
- [19]Lisa M. Martinez, Yes We Can: Latino Participation in Unconventional Politics [J]. Social Forces, 2005, 84(1): 135.
- [20]方江山. 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38.
- [21]郑功成,黄黎若莲. 中国农民工问题: 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6).
- [22]邓秀华. 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及其实现路径选择[J]. 求索, 2007, (2).
- [23]王勤田. 现代西方思潮鉴评[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104.
- [24]朱宇. 新生代农民工: 特征、问题与对策[J]. 人口研究, 2010, (2).

(责任编辑: 乌东峰)